

268

唐

兰

撰

H12
T26a

中国文字学

蓬

傅根清 导读

莱

阁

从

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字学/唐兰撰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1. 6

(蓬莱阁丛书)

ISBN 7-5325-2931-2

I. 中… II. 唐… III. 汉字-文字学 IV. H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3952 号

蓬莱阁丛书

中国文字学

唐 兰 撰

傅根清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经售处: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5.875 插页 5 字数 126,000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,000

ISBN 7-5325-2931-2

H·23 定价:10.00 元

中国文字学

唐 兰 撰

前 论

一 中国文字学是什么

中国人对文字的研究，远在纪元前几个世纪已经开始，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字书应该是《尔雅》和《史籀篇》。此外，在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等书里，已经有讨论文字的风气了。后来，为了战国时各地文字的杂乱，有些学者曾提出过“书同文”的理想，到了秦始皇帝二十八年（纪元前二一九年）在琅邪台刻石时，叙说“皇帝之功”，就有一条是“同书文字”，这一个学者们的理想，总算是达到了。那时，李斯作《仓颉篇》，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和这种整齐文字的运动当然是有关的。到了汉代，由于研究《仓颉篇》，便发生了所谓“小学”，刘歆《七略》把小学放在《六艺略》里面，一直到近代，研究小学和研究经学的地位，几乎是相等的。

把文字学叫做“小学”，这个名称是西汉人定的。据《礼记·内则》说：“六年教之数与方名，……九年教之数日，十年出就外傅，居宿于外，学书计。”可见古代入小学是兼学书数

两科的,单把文字叫做“小学”,实在不很恰当。但是,我们知道古代没有“文字”的名称,孔子说:“必也正名乎?”本可叫做“名”,《左传》说:“于文止戈为武。”也只叫做“文”,一直到琅琊刻石才发现了“文字”二字,郑康成说过“古曰名,今曰字”,可见用“字”来代表“文”或“名”的意义是晚起的。汉朝人既怕叫做“名”和公孙龙之徒的“名家”混淆,又不能叫做“文学”和司马相如等辞赋家合在一起,又不愿意就用晚起的字而叫做“字学”,所以就想出了“小学”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名称。

《汉书》说:“张敞好古文字。”又说杜林:“其正文字,过于邳、竦。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。”颜师古《汉书注》对于张吉尤长小学的注解,就说“小学谓文字之学也”。唐、宋以后人,也常常说到“字学”,但“文字学”的名称,却不经见,一直到清末,章太炎等才把“小学”叫做“文字学”。

二 文字学的特点和它同语言学的差别

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,在一个中国人看来,这个名词是很恰当的。但由西方输入的科学名词,还没有一个可以配合的名称。普通所谓 Philology,本是研究希腊拉丁古语的学科,我们只能把它译做语言学,或者更确切一些,是古语言学。Etymology 是语源学,Palaeography 是古文字学, Hieroglyph 是象形文字学,没有一个字,能相当于中国的文字学。

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特殊的,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期,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。在最古的时候,中国文字本也是图画文字,但至迟在三千五百年前,已改成了注音文字,而这种文字一直到现在还活着,被

全中国的人民,以及她邻近的地方使用着。我们既不能把它们和埃及、巴比伦等已经久已死亡的古文字一例看承,又不能把只有二十多个字母拼音的西方文字来比类,所以,这一种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学科,我们只有把它叫做“中国文字学”(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)。

口上说的语言,笔下写的文字,两者显然是不同的。因为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,研究语言也就研究了文字,所谓古语言学或古文字学,有些人甚至于想把它叫做文献学,所以,只有语言学(Science of Language)特别容易发展。反之,中国文字是注音的,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期就已经不一致,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,所以,在中国,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。但是,中国人把文字统一了古今的殊语,也统一了东南西北无数的分歧的语言,所以,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,而且一直在发展。西方的语言学,中国的文字学,是两个不同的学科,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。

有些学者把 Philology 叫做语言文字学或语文学,这是很错误的。文字学固然不能包括语言学,同样,语言学也不能包括文字学。在文字学里,不能研究到“果羸”的语源,“殷”读为“衣”的失去韵尾 n 一类问题;但在语言学里也不能研究到从二的字古都从一,“卩”字本象人跪形一类的问题。每一种科学总应该有明晰的范围,真正的语言学是在十九世纪建立的,中国的语言学刚开始,我们相信它会有很大的发展,但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,忘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,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,而抹杀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文字学。

三 中国文字学的范围

每一个文字具有三个部分：一、字形；二、字义；三、字音。在汉代，小学刚刚发展的时候，分别还不很显著，后来，每个部分都逐渐扩大，所以，宋末王应麟《玉海》已经分成三种：一、体制；二、训诂；三、音韵。到清朝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就把小学书分成训诂、字书、韵书三类。清末以来的文字学，也总包括形、音、义三方面。

但是，形和义是比较不易分的，声音部分，由于汉末的反语，魏晋的韵书，齐梁的四声，唐末的四等，元明以后的今韵学，和宋人创始而清代学者研究颇有成绩的古韵学，这些时常不断的发展，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、专门的学科。因之，民国六年时，北京大学的文字学，分由两位学者担任，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，叫《文字学形义篇》，钱玄同做的是《文字学音篇》。后来，许多学者常采用这个方法，只讲形义，避免了不太内行的音韵。渐渐音韵学独立了，不再挂文字学的招牌，于是，只讲文字学形义篇，就变成了瘸子了。

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写《古文字学导论》，才把文字学的范围重新规定。我的文字学研究对象，只限于形体，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，实际上，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。

我的分类法，单从目录学说，已是很合理的。过去小学书的名称，凡是用“文”或“字”或“文字”并用，人抵总是字书。我曾经把三类小学书的经典的名称，做过一个有趣的分类。例如：

一 许慎《说“文”解字》

二 吕忱《“字”林》

这是文字形体学里最早的两本书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“《说文》《字林》之学”，当然也可以摘取两个字叫做“文字学”。

三 《尔“雅”》

四 《“仓”颉篇》

这是文字意义学里面最早的两本书，我们可以依照六朝人的简称，叫做“《仓》《雅》学”。

五 李登《“声”类》

六 吕静《“韵”集》

这是文字音韵学里最早的两本书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“声韵学”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知道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，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。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，但在本质上，它们是属于语言的。严格说起来，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，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，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。

四 中国文字学的新领域

文字学把训诂、音韵两部分除去以后，一般人总以为它的范围要缩小了，实际上并不如此。过去有些文字学里虽然还附有音篇，有些早就只论形义，不讲音韵。至于义篇，因为没有现成的理论系统，一无凭藉，大抵寥寥儿章，只是形篇的附庸（容庚把六书当做义篇是错误的），可有可无。所以，民国以来，所谓文字学，名义上虽兼包形音义三部分，其实早就只有形体是主要部分了。

这些文字学形篇都讲些什么呢？它们大体上可以分做两

部分,一部分注重构成的理论,把宋以来的六书说演述一下,从《说文》篆文里找一些例证,像朱宗莱那样把六书分成十九类的说法,在那时很流行。另一部分只注意字体的变迁,容庚用甲骨金文等实物来对照一下字体,也颇有人效法,因为这是比较容易讨好的。(沈兼士先生的《文字形义学》,上篇除了文字之起原及其形式和作用一篇外,都是文字形义学之沿革,那是文字学史的范围,写了一百四五十叶,还只到了戴侗。下篇据目录有一、造字论;二、以钟鼎甲骨为中心的造字说;三、训诂论;四、国语及方言学;五、文字形义学上之中国古代社会进化观;六、字体论等,可是没有写出来。)

这样的文字学,先天上已经够贫弱的了。因为它们的理论根据,只有六书,而六书说的条例,建立在西汉末年以后,那时所见的材料,只是残缺的《史籀篇》,传写的古文经,和有些人改写做隶书的三千二百个小篆的《仓颉篇》。材料既少,时代又晚,所得的结论,当然很靠不住。但是,两千年以后的学者,还只根据本身问题很多的《说文》里所保留的一些材料,怎么能有进步呢?

另外一方面,宋以后出土的古器物很多,有许多人曾经去研究款识文字,虽则那些研究的方法,大都是非科学的,但材料的丰富,是仅仅研究《说文》的人所想不到的。尤其到了清代末年,陶器、古玺、货币等都有大量的发现,所以古文字学里一部重要著作,吴大澂的《说文古籀补》出现了。接着又发现了殷虚的甲骨卜辞,这是一个无尽的宝藏,近代最卓越的古文字学家孙诒让已能见到这一部分的材料,孙氏所著《名原》,想根据这类新出材料来阐明文字构成的理论,虽还不能完全脱离六书的锁链,他的见解往往是正确的。可惜自他以后,就没

有人再注意到这一方面。罗振玉、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，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，偶然也研究古文字，很有成绩，但并没有系统。容庚、商承祚等在古文字上的成绩，是搜集、整理、排比、摹写，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，此外，更自郅以下了。

《古文字学导论》开始沟通了这两方面的隔阂，在奄奄无生气的文字学里摄取了比《史籀篇》早上一千年的殷虚文字，以及比古文经，《仓颉篇》多出了无数倍的两周文字，六国文字，秦、汉文字，从这么多而重要的材料里所呈露出来的事实，使我修正了传统的说法，建立了新的文字构成论，奠定了新的文字学的基础。在另一方面，也尽量使古文字的研究，脱离了猜谜射覆的途径，走上了科学的道路。

三十年前，我的同乡老儒金蓉镜先生写信给我批评孙诒让“桃许慎而祖仓颉”，在老先生的眼光里，这就是不可恕的罪状。在那时，我也还是忠实的守家法的汉学家，治经宗郑玄，小学宗许慎。但到现在，我也走孙诒让的旧路，不过我们只拿历史材料做根据，一切旧的偶像全摧毁了。在打不破《说文》系统，跳不出六书牢笼的学者看来，诚然是大胆妄为，离经畔道，但在我们看来，只有这样，文字学才有新的生命，新的出路，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。

此外，近代文字的研究，也是很重要的。隶书、草书、楷书，都有人做过搜集的工作。楷书的问题最多，别字问题，唐人所厘定的字样，唐以后的简体字，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，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。西陲所出木简残牍，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，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。

从明代的华化西洋人创造了中国语的拼音字，以至现代的国语罗马字、拉丁化新文字，这种想推翻中国旧文字的运

动，也是值得讨论的。中国新文字究竟应该用拼音呢？用注音呢？正是文字学上最大的问题。

现在，我们把久已独立的音韵学谢绝了，也把应该独立而还没有找到出路的训诂学放开了（二十年来，卓越的训诂学家，我所知道的，只有沈兼士一人，这一科是太冷寂了。本书初执笔时，沈先生尚健在，忽然伤逝，执笔泫然），剩下只讲形体的文字学，但是它的范围，非但没有缩小，倒更充实，更扩大了。

五 中国文字和世界各区域的文字

我们如望远处看，中国文字学应该是整个文字学里的一部分，正和中国语言学是整个语言学的一部分是一样的。

谁都知道，世界最古的文字有三种，一、苏马利亚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；二、埃及的图画文字；和三、中国文字。有些人企图把这些文字说成一源，这是可笑的荒谬。但他们都由图画演进为文字，有许多地方总是相类的，我们可以由之得到文字进化上若干共同的原则。

有些人把文字进化分做四个阶段，一、图画字；二、义符字；三、声符字；四、字母。他们以为中国人跟埃及人、苏马利亚人、巴比伦人一样，只改良到第三个阶段就停止了。他们说中国人没有用字母，所以在原始时期上停留了二千年，文字的繁难，形成了中国文化进步的阻碍。

这种错误的观察者，他们不知道文化不会停留在那一点上的。远在纪元以前，中国人就懂得合音，后来发明反语，把声和韵分开，这种发明，将有一千八百年。在这时期内，中国

曾经有过璀璨的文化,使她的邻邦高丽、日本、安南等都采用了她的文字。可见中国文字足够适应那时的需要,它能一直应用到现在,一定有它本身的价值。

指摘中国文字的人,同时也往往指摘中国语言,像:单音节,没有语尾,没有形式变化等,认为是低级的语言,可是现在的语言学家大都已不这样想了。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,而不变为拼音文字,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。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,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(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),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统写出来,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?

但是当邻邦采用中国文字的时候,和她本国的语言就不能适应了。日本人借用汉字来表音,例如“弦”字,《和名类聚抄》说“此间云由美波利”,狩谷望之引《持统记》作“由八利”,不论“由美波利”或“由八利”,总是日本古代语里代表“弦”的意义的语音,这和中国人翻译匈奴或西域的语言时所谓“撑犁孤涂”或“蒲萄”之类是一样的。可是日本语音本来简单,所以借用汉字,就有许多是习用的,后来受了梵文的影响,把汉字归纳成片假名、平假名,就只有最简单的四十七个音符,成为一个新系统了。

腓尼基人的创造字母,显然也是借用别的民族(有人说是埃及)的文字来适应他们自己的语言。据说他们善于经营商业,所以能归纳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。因为埃及人和属于闪族的腓尼基人的语言,都是辅音占优势,元音有些不定,并且好像黏属于辅音,所以他们的文字,往往只把辅音写出来。他们的语言,既是多音节的,又是复辅音的。复辅音的字,最容易分析,譬如英语的 Script 显然可以分成五个单位,假如把

元音疏忽了,那就是五个字母。所以这种归纳出来的字母,本来就没有元音,到希腊人再借用这个系统来写她的语言时,把用不着的辅音字,改为元音字母,才成为包含元音辅音的一套字母。

中国人对语音的感觉,是元音占优势,辅音比较疏忽,和含、闪语系正相反。一个中国字的声音,由中国人的说法,是声和韵的结合,声是辅音,可是有时带着介音,韵是元音后面带一个韵尾辅音。中国语的韵尾辅音,大体很微弱,只是一种声势,所以逐渐在消失。(有些字没有韵尾,但据学者们的推测,也是原来有尾而后来消失的。)声韵虽然并列,韵的部分总占优势。我们可以看见:一、形声系统里,韵母大体相同,而声母不大固定。(如“同”从“凡”声,“唐”从“庚”声,“𪛗”字在金文可读做“𪛗”,也可读做“𪛗”之类。)二、许多声母也常会消失到只剩元音,和韵尾辅音一样。中国文字既然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,而这种音节以元音为中心,辅音黏附在元音的前后,似乎是不可分的,那就无怪远在一世纪时最大发明的反语,只能分析声韵,而没有清晰的字母了。

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,而只是注音的,在学习时虽然不如拼音的方便,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,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。中国文字不仅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重要材料,也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,是研究文字学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。

世界上旧有的及现在还存在的文字,种类很多。其中有些是和中国文字有亲族关系的。中国西部有傣、么些等文字,史禄国教授曾给我看过太平洋里一个岛屿上的铭志文字,有些字(如“音”字)的写法,和中国古代完全相同。至于契丹、

女真、西夏等文字，和汉字的关系，更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现在，各种文字，几乎都有专家在做研究，还没有人作综合比较的工作，但我相信将来总可以发展成为文字学，一门新兴的科学。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字学，在这种研究中是应该占最重要地位的。

六 中国文字学史略

中国人研究文字，据现在所知，是周朝开始的。《尔雅》据说是周公做的，所记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，很多是新造的形声字，倒很像是西周前期的，释诂、释言、释训等篇，就一定是秦、汉间人所增加的了。《史籀篇》旧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，王国维以为周、秦间的西土文字，现存的“商鞅量”在秦孝公时，跟小篆很接近，《说文》所引的籀文则和春秋时铜器和石鼓文较接近，我把石鼓定在秦灵公三年（纪元前四二二），较“商鞅量”早七八十年，《史籀篇》的成书，最晚也得在战国初期。

《左传》里有一处解释文字：“止戈为武”，“反正为乏”，“皿虫为蛊”，假使这些记载是可靠的话，《春秋》时已有这种风气了。六国时人对于文字是很注意的，《周易》的彖传等，有许多解释，是训诂学的蓝本。《周礼·保氏》有六书的名目，《韩非·五蠹》说：

仓颉之作书也，自环者谓之私，背私谓之公。

仓颉作书的传说，那时正在流行，这都是文字学最初的雏形。六国时文字杂乱太甚，也就产生了“书同文”的理想。

秦始皇统一了天下，也统一了文字，李斯作《仓颉篇》，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显然要用此宣传小篆，作

字体的范本。汉初人把三篇并合了，仍旧叫做《仓颉篇》，摹仿这一类字书的有《凡将篇》、《元尚篇》、《急就篇》、《训纂篇》等，只有《急就篇》，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。

这种字书都是为小孩子讽读而编的，所以叫做小学。西汉时为小学召集过两次大会，一次是宣帝时征齐人来正《仓颉篇》的俗读，张敞从他们学了，传到杜林，做了《仓颉故》和《仓颉训纂》，汉人认为他是小学的创始者。第二次是平帝时征爱礼等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廷中，以礼为小学元士，扬雄采作《训纂篇》。此外，扬雄还注过《方言》十三篇，是近于《尔雅》，而又注明各地方不同的语言的一部字书。

这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古文经的重新发现。古文经的来源，有两类：一类是传世的古书，如：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氏传》等，一类是孔子宅壁中拆出来的旧本，如：《古文尚书》、《礼古经》、《古文论语》等。流传到刘向父子校中秘书，才发现它们的可贵。刘歆因而创立他的古文经学。从文字形体来看，这都是六国晚年的抄本，而且往往是重抄的，所以免不了有错误。杜林据说宝藏过一卷漆书《古文尚书》，他的弟子卫宏曾做过一本诏定《古文官书》，是辨别古今字体的书。

那时的今文经学家喜欢解释文字，不过都很可笑，如“马头人为长”，“人持十为斗”，“土力于乙者为地”，“八推十为木”之类，在《春秋》纬里所存最多，都是根据已经变为简易的通行的隶书来说的。他们甚至于以为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所造的，他们以为文字是“父子相传”，不应当有改易，所以他们不相信古文字，当然更不相信古文经。

古文经学家建立了一个文字学系统，就是“六书”，在《周礼》里本来只是一个总名，现在给分别出来了。六书有三种说

法,最初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,那显然是抄袭刘歆的《七略》的。又见于郑众《周礼注》和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,郑、许都是刘歆的再传或再再传的弟子,所以可以认为刘歆一家之学。不过,我很怀疑,这说法未必是刘歆独创的。秦、汉之际有一本书叫“《八体六技》”,八体固然是秦书八体,六技决不是王莽时的六书,分析古文奇字等名称的六书,而应是象事象形的六书。六技或许是六文之误,六朝人常说到“八体六文”,六文就是六书。刘歆的说法,可能是抄这本书的。

根据古文经,《史籀篇》、《仓颉篇》,以及别的古书里的材料,和“六书”系统,许慎写成中国文字学里惟一的经典:《说文解字》。他的主要动机是要澄清那时一班俗儒鄙夫的谬说,虽则他生在那个环境里,未能免俗,像“一贯三为王”,“推十合一为士”,“甲象人头”,“乙象人颈”,说字的方法,比之那班今文经学家是不相上下的。他认为文字是有条例的,先有“文”,“文”是“象形”、“指事”,原始的文字,而“字”是由孳乳而产生的“会意”、“形声”等新文字。他用五百四十部来贯串一万多个文字,用篆书为主体来解释文字,因为他想这样可以得到造字时的本义。

“五经无双许叔重”是贾逵的弟子,当时就负盛名,马融很敬重他。他的书据后序是和帝永元十二年(西元一〇〇)写成的,到安帝建光元年(西元一二一)才献上,不到一百年,他的书就流行了,郑玄注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,应劭作《风俗通》,都引用过,连雄才大略的曹操下的命令里也引用过《说文》。

《说文》由目前看来,错误很多,但是它曾支配了中国文字学一千八百年。北齐颜之推说:

客有难主人曰:“今之经典,子皆谓非,《说文》所言,